

建设多层次的国家服务业集聚中心：综合评价与政策建议

刘奕 李 焱

摘要 一国中心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战略地位，主要是由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功能体现出来的。从提升经济控制力出发，建设服务业强国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多层次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的功能建设和战略布局。作者在回顾全球服务业中心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新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集聚形成的基本原理入手，将要素禀赋、外向联系、内向联系、制度因素、市场规模、知识资本、发展成本和消费等影响因素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通过建构服务业集聚中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105个城市在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打造方面的综合实力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应重点依托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整体提升我国在世界服务网络中的引领和控制能力；深圳、广州、重庆、天津、武汉、杭州、南京、成都、西安、郑州、沈阳、青岛、长沙、昆明和乌鲁木齐等15个城市，最有希望成为具有综合服务或专业化功能的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

关键词 服务业 集聚中心 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51X (2018) 04-0038-16

一、问题提出

从20世纪5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生活在城市。过去25年里，全球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居民占全球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不到43%增加到2015年的超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扩大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路径与战略研究”（批准号：14ZDA084）；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创新工程项目“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服务业发展和开放研究”（批准号：2018CJY01-B003）。

【作者简介】 刘奕（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邮政编码：100028；李焱（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邮政编码：102488。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匿名评审，当然文责自负。

过 54%。其中，1/8 左右的城市居民生活在人口规模超千万的大城市中，德里、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的人口在此期间增加了 2 倍。全球的城市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2050 年城市居民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将达到 66%，人口规模超千万的大城市将达到 41 个（UN，2014）。

城市规模日益增长的同时，伴随全球化的推进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对于提升国家经济控制力的作用越发重要，城市间对于企业、投资和人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已有研究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等级，反映了该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位置（Alderson et al.，2010）。而国家中心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战略地位主要是由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功能体现出来的，这些城市通常是高度集中的世界控制和管理中心、金融等服务业的集中地和创新基地，控制着全球经济系统的运行（Sassen，2006）。全球服务网络中的顶端城市虽然主要分布在美国和欧洲，但亚洲的崛起势头很明显，中国的国家中心城市在全球中心城市等级体系中的中心性也越来越强（Timberlake et al.，2014）。我国的许多区域中心城市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嵌入全球服务网络，呈现一定的指挥控制功能和等级特征，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故此，从经济控制力提升出发，在新的发展阶段建设服务业强国，在空间结构优化方面主要表现为多层次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的功能建设和战略布局。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是中国参与服务业全球竞争的核心地域、国际交往的国家门户，同时也是对所在区域（跨省地区）具有强大的服务能力和辐射影响力的城市。作为全国服务业空间网络的“顶端”城市，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的空间布局事关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创新转型。

近年来，地方政府打造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的热情方兴未艾，有 183 个城市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Friedmann 和 Sassen 的假说均强调跨国际资本汇集功能，地方建设全球城市的实践也主要表现为在吸引外资和世界 500 强方面的激烈竞争。然而，在五彩斑斓的全球城市版图上，每个城市的发展路径不会完全相同，服务业中心城市的形成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文在回顾全球服务业中心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新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集聚形成的基本原理入手建构服务业集聚中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全国 105 个地价监测城市为样本，对这些城市在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打造方面的综合实力、优势及短板进行评价，以期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打造服务业强国、建设多层次的服务业集聚中心提供有益参考。

二、文献述评

（一）全球城市网络中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全球城市的研究最早发端于 Hall（1966）。他通过对伦敦、巴黎、兰斯塔德、莱茵-鲁尔、莫斯科、伦敦、纽约、东京的观察认识到，一些城市在世界经济运行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非同寻常，不仅吸引了大量国际组织和国家政治机构，而且是世界的

经济权力中心，是贸易、金融和人才集聚的中心。Friedmann (1986) 在其后的研究中指出，经济因素特别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秩序对于全球城市的形成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代后，发达国家进入了再城市化和城市复兴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更加快速全面地推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城市间，尤其是国家中心城市之间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Sassen (1991) 通过对纽约、伦敦和东京的案例分折，认为银行、金融、保险、会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领先的跨国公司同指挥和控制功能紧密相关，是塑造全球城市的最主要因素。Derudder (2006) 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使用全球化的关联程度度量全球城市的空间等级体系时，可以使用两类指标：一类是连接外部性，包括电信网络的渗透率、机场旅客或海上交通流量；第二类是跨国公司跨国服务网络的地理分布。循着上述思路，全球化与世界城市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GaWC) 研究组用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网络空间分布给出了世界城市的位次，发现这一研究框架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国家时并不完全适用 (GaWC, 2010)。东京和首尔是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成长起来的，其世界城市的成长路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更是政治上努力的结果，并不符合纽约那样“标准的”世界城市成长路径 (Hill and Kim, 2000)；故此，除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跨国公司服务网络之外，还应综合考虑城市发展的社会、政治和外环境因素，如外国居民和国外游客、科学研究活动、举办国内外文化和体育赛事，文化影响力、城市可达性和宜居度等 (Cook, 2006)。

(二) 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看全球城市的战略地位

Sassen (2005) 指出，全球化的推进使得跨国公司在空间上愈发分散，为履行日益复杂的管理、协调、服务、融资等战略功能，跨国公司总部将越来越多的会计、法律、公共关系、电信等服务外包，并在部分城市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跨国服务网络。故此，Sheppard (2002) 从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出发，认为城市的战略地位表现为其在跨国网络中的位置和互动关系。考虑到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是全球网络的塑造者，城市的战略地位不仅仅表现为会计、广告、建筑、金融、法律等领域的关键生产性服务企业在城市中的运作，更体现为城市在关键企业服务网络构建中存在的必要性 (Taylor et al., 2014)。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的存在可以分为普遍性存在和战略性存在两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主要金融机构、临时工作机构的布局战略多为前者，主要是通过服务于本地客户需求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广告、建筑设计和法律服务的相关企业多为战略性存在，这类企业总是选择战略上最重要、最具全球影响力、与全球市场最为连通、在创新上走在前沿的城市进行布局 (Goerzen et al., 2013)。从空间组织形式上看，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可能会选择多个地点设立多个办公室，这些办公室彼此连接构成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全球服务网络，但这些地点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是完全不同的。实现战略存在的自有办公室主要集中在伦敦、纽约、法兰克福等位于全球服务业价值链顶端的城市，这些城市雇员更多、存在规模更大；而临时服

务机构主要存在于在服务网络中目前市场较小、战略性较弱但未来较有前景的城市，如墨西哥城、蒙特雷、奥克兰等。总体上看，城市在服务网络中的战略地位主要体现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在此施展并增进其核心竞争力的能力（Faulconbridge et al. , 2011）。通过定义反映 175 个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在 526 个城市间的工作、信息和知识联系强度的指标，Taylor 等（2014）衡量了 2010 年这些城市在全球服务网络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全球服务网络中的顶端城市主要分布在美国和欧洲，亚洲的崛起势头也很明显；从中国的情况看，上海作为服务业中心城市战略地位最为显著，主要承担经济中心的作用。

（三）已有研究评述

目前，解释城市在全球服务网络中地位的文献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 Sassen 为代表的全球城市控制力的研究，主要基于对纽约、伦敦、东京等超级城市（Hyper Global City）的个例分析，把城市的战略地位等同于国际高端生产性服务中心；二是以 Taylor 为代表的全球服务网络空间的研究，通过建立基于网络联系强度的分析框架，对全球城市在服务网络中的战略地位进行了较好刻画。但既有研究仍存在以下缺憾。第一，现有对全球城市的分析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所有城市均为地图上的一个点，聚焦于等级体系、网络组织和空间联系，对全球服务网络核心节点，特别是高等级服务中心城市的形成机理和路径描述千篇一律（Bassens et al. , 2012）。指标设计往往忽略了城市的地理区位、历史联系和国家战略导向，并且没有考虑市场规模、规制特征、进入障碍、人力资源、实物资产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Bagchi-Sen and Sen, 1997）。第二，已有指标体系仅考虑了高级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作用，过分重视城市的生产功能。虽然在城市经济学研究中，城市在功能上一直被视作强于生产而弱于消费（Glaeser et al. , 2001），但消费功能（如商业、旅游等）在判定服务业中心城市战略地位上理应得到相当的重视。第三，城市的战略地位不仅取决于外向联系，还表现为内向联系，即与腹地的关联。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所起的作用是将全球服务网络同本地化经济联系起来，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正如 Olds 和 Yeung（2004）指出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城市并不一定依托于全球化管理中心的形成，而更依赖于资本、人员、产品和服务以及信息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的内部流动，但现有的指标体系并未关注到国家内部服务网络的城市等级体系及其空间组织形式。第四，已有指标体系忽略了中央和地方在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构建中的特殊作用，而政府在东亚各国资源配置和创新能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尤为显著。第五，现有指标设计过分强调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在国家经济控制力形成中的作用，阻碍了我们对第二等级城市作用的认识（Chen and Kanna, 2012）。研究区域中心城市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地方实践，对于系统性认识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位置和控制力形成机制尤为重要。

正如已有研究指出的，当一个国家有几个全球城市崛起时，自然会推动这些城市在国内的城市等级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形成合作网络。探寻全球城市在世界服务网络中的战略作用，不仅需要重视由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等经济指标衡量的该城市与外

部世界的联系度,更需深入研究每个城市在本国城市等级体系中的功能及其承担的特殊作用(Chubarov and Brooker, 2013)。基于此,本文试图将要素禀赋、外向联系、内向联系、制度因素、市场规模、知识资本、发展成本和消费等影响因素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综合分析105个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优劣势,并结合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中国全球经济控制力,提出打造多层次国家服务业集聚中心的方向与路径。

三、指标体系建构

(一) 服务业集聚中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集聚形成的基本原理出发,通过衡量服务业集聚中心形成所需的本地市场效应、消费成本效应和挤出效应,并添加促进服务业集聚的政府作用以及载体建设、公共服务、人力资本等潜变量,建构服务业集聚中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设计着重考虑城市服务业发展的质量和潜力,特别是将服务业发展的载体空间、发展成本、融通能力等进行统一考核。根据服务业集聚的原理,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导向性、可操作性的原则,指标体系将国家服务业集聚中心的竞争力分解为本地消费规模、制造业中间需求、发展成本、外部需求、业态先进性、载体支撑、融资支撑、公共服务支撑、地区创新环境和地方政府行为10个一级指标,并在一级指标框架基础上细化出22个二级指标。在此基础上根据因变量之间不相关、因变量与自变量强相关、自变量与自变量强相关三个原则进行两两偏相关系数分析,剔除了1个一级指标和1个二级指标,最终形成了9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的服务业集聚中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这一指标体系从发展的需求结构、质量和效益等不同角度解释服务业集聚形成的竞争力水平,能够准确把握服务业的发展状况,并有针对性地衡量政府的引导作用。

表1 服务业集聚中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名	计算方法
本地消费规模	市辖区人口密度	S1	市辖区总人口/建成区土地面积
	居民支付能力	S2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制造业中间需求	工业总产值	S3	工业总产值
	劳动生产率	S4	全员劳动生产率
	企业在价值链的位置	S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税额
	企业服务外包需求	S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的倒数
发展成本	商业用地地价	S7	商业用地地价
外部需求	客运总量	S8	客运总量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	S9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
	货运总量	S10	货运总量

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名	计算方法
业态先进性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S11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支持性服务业占比	S12	支持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占比
载体支撑	新增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S13	新增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商服用地占比	S14	商服用地面积/新增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公共服务支撑	软环境	S15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公共服务	S16	医院卫生院人均床位数
地区创新环境	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	S17	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
	信息服务	S18	人均电信业务收入
	第一知识库	S19	科学支出
地方政府行为	GDP 增速与服务业占比交互项	S20	GDP 增长率 ×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地方财政能力	S21	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指标选取依据

已有研究表明，服务业在城市中的集聚不仅受到具有上下游关系产业的相互影响，还受到市场需求规模、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发展环境的共同作用。服务业倾向于定位在供应商和需求方密集之地（Glaeser and Kohlhase, 2004），因此本文用居民支付能力代表本地的服务需求，用客运总量、货运总量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来表示服务业的外部需求。考虑到服务业供给具有一定的阈值，而且在同样的工资水平下，城市的消费功能也会因密度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Glaeser et al., 2001），因此本文也将市辖区人口密度作为影响服务业集聚的变量纳入指标体系。

服务业集聚中心建设的前提是发达的服务网络，因此本文将城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纳入指标体系。从生产性服务外部化的角度看，企业内外价值增加可以分为包括生产制造、销售、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在内的基本性活动，以及包括人力资源、研究开发、金融财务等在内的支持性活动（迈克尔·波特，2002），支持性活动外包可以使本地企业更好地共享价值链上各环节伙伴企业之间的溢出性知识，有利于城市充分实现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刘明宇等，2010），因此指标体系也考虑了支持性服务业的占比情况。

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会在其客户（包括服务提供商、制造企业总部和大的公共组织旁）周围集聚（Shearmur and Doloreux, 2008）。制造业可得性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主要因素，竞争性服务经济的发展能力取决于作为生产性服务业最密集使用者的制造部门的结构（Andersson, 2004）。故此，本文用工业总产值表示来自制造业的本地中间需求。同时，采用单位劳动力的产值（即全员劳动生产率）表征生产效率。在制造业附加值描述方面，由于制造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可以用附加值提升

来体现,相比于工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等非市场化的效率指标,本文借鉴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的研究,采用“贡献价值”(即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所得之总额与由外部买进的原材料或服务的采购额之间的差值)表征企业的产出价值和创造最终收益的能力。由于该定义与中国统计体系中的“利税”这一指标吻合,故本文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税额来表征工业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①此外,大型工业企业特别是较低技术含量的企业会将大学作为主要技术来源,而小企业则倾向于引入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企业作为外部知识源(Siegel et al., 2007)。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劳动分工、专业化及产业竞争所导致的服务外包和制造业服务化会受到工业企业规模的影响,规模较大的企业研发、营销、商务、物流等服务的自我服务比例较高,从而抑制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潜在需求向有效需求的转化(樊文静, 2013)。本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的倒数表示企业服务外包需求的影响。

科研机构 and 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区域创新系统的第一知识库,发挥着新知识、新技术的生产功能。知识的外溢效应和集体学习的互动过程使得城市中的企业获得知识更加容易,尤其是获得隐性知识,经革新后使其显性化,创造出高于原来的新知识形态,从而使得“集体学习过程”逐渐演变为一种地区的“创新环境”(刘奕、夏杰长, 2009)。本文用每万人拥有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和科学支出来刻画区域创新系统。此外,已有研究显示,可贸易性促使居于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其对应等级市场区域的企业之间存在频繁的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才流等要素交换,供需双方以基础设施为支撑的通达性、由多种交通与信息通信技术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溢出成本将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产生影响(方远平、阎小培, 2008)。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不但将促进服务业的集聚(Coffey and Bailly, 1992),还将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的互动成本逐渐降低,进而极大地促进生产性服务外包。因此,本文采用人均电信业务收入来衡量服务业信息外溢的便利程度。

考虑到我国的发展实际,服务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所依托的高素质劳动力和资金支持之外,还需要土地资源特别是园区载体等要素投入支持。而新增用地资源不足和高企的商务成本,近年来也成为影响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本文将商业用地地价、新增国有建设用地面积、商服用地与新增国有建设用地面积的比重纳入指标体系。

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从业者通常是高层次、高创造力的创意阶层,在对城市的选择上表现为强的偏好异质性,除了产品和服务多样性因素之外,对软性要素特别是公共服务的追求也是其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因此,政府对软环境和公共服务

^① 工业企业利税额指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税金、教育费附加、资源税和利润总额之和,本文用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利润总额来表示。产品销售税金不仅包括主要经营业务应负担的增值税,还包括产品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但由于2009年之前未统计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本文以本年应交增值税代替。

的投资也将对服务业集聚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分别采用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和医院卫生院人均床位数表示。

“事前定价”“事后检验”的产业特性所导致的服务效用不确定性，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和交易涉及密集和复杂的契约安排（汪德华等，2007）。完善的经济规则是促成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交易、降低信任成本的前提。就中国而言，无论是市场导向还是政府主导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政府的投资与规划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规模的大小和对服务业的支持程度将影响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本文采用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来衡量地方政府对集聚区的支持能力。进一步地，本文采用城市 GDP 增速与服务业占比交互项来表示地方政府对发展服务业的支持程度。在三产占比较高、GDP 增长率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容易选择工业化道路而不是发展服务业。

（三）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

本文选取国土资源部全国 105 个地价监测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土资源年鉴》。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即利用降维的思想将多个变量通过线性变换以选出较少个数重要变量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少数几个主成分来揭示多个变量间的内部结构，设法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综合指标。

四、评价结果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

应用上述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 2015 年全国 105 个城市进行服务业集聚竞争力分析。根据 Kaiser-Harris 准则，保留特征值大于 1 的主成分，共提取出 5 个主成分，可以解释所有原始指标 80% 的信息，基本符合主成分分析法的要求（见表 2）。

表 2 主成分提取结果

成分	合计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1	5.12	24.0	24.0
2	4.16	20.0	44.0
3	3.97	19.0	63.0
4	2.08	10.0	73.0
5	1.42	7.0	80.0

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 3 所示。第一主成分在货运总量（S10）、支持性服务业占比（S12）、第一知识库（S19）、商业用地地价（S7）、房地产开发投资

完成额 (S9)、居民支付能力 (S2) 等变量上均具有较高的载荷, 故命名为“发展条件”; 第二主成分在工业总产值 (S3)、企业在价值链的位置 (S5)、新增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S13) 和公共服务 (S16) 等变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 故命名为“市场潜力”; 第三主成分在商服用地占比 (S14)、软环境 (S15)、信息服务 (S18) 与地方财政能力 (S21) 等变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 故命名为“要素支撑”; 第四主成分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S11) 及 GDP 增速与服务业占比交互项 (S20) 上具有较高的载荷, 故命名为“政策环境”; 第五主成分在企业服务外包需求 (S6)、劳动生产率 (S4) 等变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 故命名为“需求支撑”。

表 3 因子载荷矩阵

	第一主成分 F1	第二主成分 F2	第三主成分 F3	第四主成分 F4	第五主成分 F5
S1	0.16	0.10	-0.27	-0.53	0.16
S2	0.56	0.27	0.39	0.36	0.11
S3	0.29	0.71	0.53	-0.09	0.14
S4	-0.11	-0.09	-0.17	-0.30	0.79
S5	0.44	0.67	0.45	-0.11	0.17
S6	-0.05	-0.25	-0.05	-0.33	-0.77
S7	0.78	0.09	0.50	0.16	-0.03
S8	0.55	0.45	-0.09	0.18	-0.10
S9	0.63	0.70	0.16	0.15	-0.05
S10	0.89	0.19	0.30	0.08	0.00
S11	0.57	0.13	0.16	0.64	-0.09
S12	0.86	0.31	0.21	0.01	-0.01
S13	-0.04	0.91	-0.11	0.11	0.10
S14	0.01	-0.18	0.75	0.01	0.00
S15	0.39	0.13	0.79	0.23	-0.11
S16	0.46	0.84	-0.02	0.04	-0.02
S17	0.40	0.65	-0.13	0.40	0.01
S18	0.25	0.02	0.72	0.35	-0.13
S19	0.73	0.32	0.54	-0.05	0.04
S20	0.25	0.27	0.14	0.74	0.24
S21	0.38	0.16	0.85	0.21	-0.02

(二) 服务业集聚中心竞争力评价

在表 3 的基础上计算得到各主成分的得分, 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加权, 最终得到各城市的分项得分、综合得分以及相应排名, 综合排名前 50 位城市的各项得分如表 4 所示。

表4 服务业集聚中心竞争力评价结果（前50位城市）

城市	发展条件得分	市场潜力得分	要素支撑得分	政策环境得分	需求支撑得分	综合得分	综合排名
北京	6.887	-0.219	0.395	-0.059	0.229	1.694	1
上海	4.687	1.381	1.882	-2.177	0.435	1.571	2
深圳	0.305	-0.726	7.595	0.046	0.026	1.378	3
广州	3.699	0.502	-0.891	1.434	-0.190	0.949	4
天津	-0.374	2.972	1.301	-0.452	0.893	0.769	5
重庆	-0.014	5.298	-1.255	-0.456	-1.383	0.676	6
南京	1.046	0.399	0.124	1.138	0.710	0.518	7
杭州	1.238	0.826	0.114	0.651	-0.577	0.509	8
苏州	-0.586	2.113	1.535	-0.278	-0.623	0.502	9
武汉	-0.007	2.344	-0.335	0.618	0.154	0.476	10
成都	0.517	2.148	-0.478	0.565	-1.057	0.445	11
郑州	-0.758	2.322	-0.188	0.984	-0.186	0.332	12
青岛	-0.482	1.425	0.309	0.461	0.342	0.298	13
长沙	-0.533	1.509	0.019	0.409	0.544	0.257	14
厦门	0.719	-1.293	1.255	1.383	-0.756	0.238	15
潍坊	-1.467	1.074	1.693	0.031	0.618	0.231	16
西安	0.869	0.653	-1.219	1.467	-0.565	0.215	17
无锡	-0.205	0.351	0.849	0.089	0.113	0.199	18
东莞	-1.100	0.011	2.130	1.544	-1.668	0.180	19
贵阳	0.599	0.138	-1.018	2.136	-0.161	0.180	20
珠海	-0.625	-0.898	2.096	1.346	-0.343	0.179	21
宁波	-0.031	0.430	0.814	-0.228	-0.610	0.168	22
佛山	-0.044	0.515	1.325	-2.257	0.535	0.156	23
合肥	-0.252	0.535	0.044	0.674	0.427	0.152	24
徐州	-0.193	0.468	0.070	-0.769	2.295	0.144	25
福州	0.294	0.094	-0.194	0.871	-0.027	0.138	26
烟台	-0.688	0.662	0.502	-0.094	1.174	0.135	27
昆明	0.310	0.335	-0.495	1.222	-0.548	0.131	28
济南	0.017	0.573	-0.459	1.288	-0.423	0.131	29
南通	-0.591	0.881	0.363	-0.265	0.545	0.115	30
乌鲁木齐	-0.056	-0.637	-0.394	2.656	0.896	0.113	31
沈阳	-0.137	1.245	-0.267	-0.525	-0.098	0.106	32
常州	-0.319	0.083	0.522	0.018	0.879	0.103	33
石家庄	0.159	0.686	-0.661	-0.649	1.157	0.066	34
长春	-0.264	0.561	-0.150	0.102	0.489	0.065	35
大连	0.069	0.078	0.186	0.265	-0.663	0.048	36
呼和浩特	-0.051	-0.864	-0.307	2.242	0.910	0.044	37

续表

城市	发展条件得分	市场潜力得分	要素支撑得分	政策环境得分	需求支撑得分	综合得分	综合排名
拉萨	-0.014	-1.557	0.989	2.661	-1.404	0.041	38
太原	-0.010	-0.332	-0.471	1.982	-0.162	0.029	39
哈尔滨	0.271	0.597	-1.018	0.721	-0.607	0.021	40
兰州	-0.140	-0.176	-0.711	1.826	0.516	0.015	41
南昌	-0.366	0.253	-0.132	0.685	0.102	0.013	42
南宁	0.192	-0.100	-0.643	0.763	0.386	0.007	43
海口	0.510	-1.493	0.063	1.871	-0.230	0.007	44
扬州	-0.083	-0.096	0.014	-0.530	1.191	-0.006	45
淄博	-0.499	-0.075	0.524	-0.668	1.282	-0.012	46
泉州	-0.898	0.890	0.349	-0.065	-0.698	-0.027	47
银川	-0.774	0.005	0.271	0.930	0.071	-0.035	48
唐山	-0.540	0.520	-0.084	-1.079	1.458	-0.048	49
临沂	-0.641	0.969	-0.291	-0.636	0.424	-0.049	50

注：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列出综合排名前50位城市的评价结果。其他城市的评价结果，读者可与作者联系获取。

从综合得分来看，北京、上海的得分均在1.5分以上，同其他城市拉开了较大差距，故应选择北京、上海建设世界服务业中心城市。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深圳的得分已接近1.4分，但主要源于其商服用地占比、软环境、信息服务与地方财政能力等指标上具有较高的数值，总体发展条件和服务业占比还不能与北京和上海匹敌。未来十年，从服务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各项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的实施，客观上会为北京、上海等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在更大空间范围内配置各种要素提供有利条件，使其在文化、科技、创新服务、高端消费等国际性职能方面有更大突破，逐渐向全球城市服务业网络体系顶端移动。北京、上海这两大世界服务业中心城市的打造，将在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集聚度的同时，整体提升我国在世界服务网络中的引领和控制能力。

在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的选择上，可选择综合得分排名在第3~33位的城市，其综合得分均在0.1分以上。其中，杭州、成都、南京、西安、广州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具有跨省域范围中心职能（如交通枢纽、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等）的城市。由于兼具历史文化名城和区域中心的优势，在这类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成长路径应尤其突出国家文化交往中心和品质宜居两大功能。未来十年是国家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关键时期，深圳、武汉及上述科研实力较强的城市有望适应国际产业研发转移趋势，在新技术成果的孵化与市场交易方面、产业经济价值链的延伸与市场化方面形成具有较强科技能力的国际创新服务中心。武汉、长沙、沈阳、郑州这四座城市在近现代中国发展史上都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分别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东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城市。更为重要的是，这四座城市是我国推进制造业 2025 战略的重镇。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全面扩展及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加之未来十年，随着长江中游、黄河中下游、成渝等地区在“十三五”形成新的人口集聚中心，由此带来的商贸物流、教育文化、健康服务、休闲旅游等服务需求也将引发生活服务业在这些城市的集中布局。此外，国际空港、陆港门户和能源设施的兴建，加之相对均衡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获批以及战略性互联互通等重大项目的启动，一方面有利于面向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湄公河次区域等国际次区域的边境省区中心城市（如乌鲁木齐和昆明）于“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在国际贸易、科技与文化交流、国际门户职能发展等方面有所作为，培育成为新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另一方面有利于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上的海港、空港、陆港门户城市（如重庆、天津、郑州、青岛等）深化对外开放功能、寻求贸易创新发展，形成新的国际商贸物流网络中心。上述变化将使得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在高端集聚的同时，形成沿海与内地、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平衡协调、纵深联动的服务业增长格局。

以服务业集聚中心竞争力评价结果为基础，综合考虑城市的历史地位、国家战略导向、第三产业占比、地域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我国服务业空间格局的变化，可以认为北京、上海是我国打造世界服务业中心城市的不二选择，未来应重点依托这两座城市，整体提升我国在世界服务网络中的引领和控制能力；而深圳、广州、重庆、天津、武汉、杭州、南京、成都、西安、郑州、沈阳、青岛、长沙、昆明和乌鲁木齐等 15 座城市，目前最有希望成为具有金融、贸易、科技创新、商务服务枢纽和文化交流门户等综合服务或专业化功能的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特别说明的是，苏州、无锡、宁波等城市第三产业占比相比区域内其他中心城市而言较低，而长春、哈尔滨、南宁、大连等城市在经济总量、服务业体量、人口规模、制造企业服务外包需求等方面目前尚不足以达到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的要求，因此本文没有选择这些城市作为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

五、政策建议

从提升国家经济控制力角度出发，为优化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形成多层次的服务业集聚中心，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相关政策体系的配合。为更好适应内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促进服务业尽快形成布局科学、分工合理的区域空间发展格局，以下政策需做出相应调整。

第一，将各层次服务业中心城市梯队纳入国家战略体系，借相关政策规划编制之机，从国家层面加以统筹推动。以整合区域空间和创新区域一体化政策为前提，以都市区空间协调管制和战略性服务设施布局为抓手，加快区域产业空间结构转型，不断

完善区域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积极推进以都市圈、城市带为依托的区域服务业发展格局,使服务业从分散的地方性自主发展逐渐转向都市区网络化整合发展。

第二,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结合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型升级、“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发展战略,继续在各地聚焦重点领域、搭建优势平台,扩大范围、深入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在详细总结前期试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注重示范经验和发展模式的推广和复制,以及国家层面体制机制和配套政策的突破。通过采取先行先试、集成政策、重点支持等方式,以点上的突破带动面上的创新,着力引导服务业领域的理念创新、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管理创新。

第三,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领域,暂停或取消在金融、商贸、商务、社会服务业等领域对投资者资质、股比、经营范围的要求,重点发展提供全球性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在产业融合的大背景下,探索在经营资质、功能许可、业务牌照等方面建立跨界行业的准入及监管机制;积极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放宽服务企业注册登记条件。构建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税收体系,尽快形成鼓励离岸业务发展和境外股权投资的税收政策;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形成创新要素集聚、资源优化配置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增强人民币跨境服务功能,加快实施以负面清单为主体的外汇管理模式、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的金融监管体制;积极发展平台经济,加快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定价影响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化交易市场。

第四,改进管理体制、政策措施和 workflows,打破服务业中心城市发展载体制约。首先,应改革完善服务业用地管理制度,推动土地差别化管理与引导服务业供给结构调整相结合,在适当提高服务业用地规模和比例的基础上,加大城市土地盘活力度,加强服务业用地出让合同履行管理。其次,研究制定挖潜盘活的城镇存量土地和城乡建设用地的政策措施,需适应中心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融合发展的要求,尽快制定支持综合用地“功能混合、一地多用”的相关配套政策及土地出让金管理机制。最后,编制和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时,应在程序上将产业规划论证前置,破除相关规划在服务业发展上的黑箱效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各服务行业的空间布局,充分考虑服务业项目、设施的建设用地需求。

第五,加强服务业中心城市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全面提升通关效率。加强国际数据通道建设,完善跨境陆海缆基础设施;推动政府逐步开放数据资源,推动“死数据”到“活数据”的转变;稳步放开存储转发类、多方通信、国际互联网接入、呼叫中心、信息服务(App应用)等业务。完善人才制度,对于超大城市高端创新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在落户、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相应待遇。

参考文献

樊文静(2013):《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悖论及其形成机理》,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第10~21页。

方远平、阎小培（2008）：《大都市服务业区位理论与实证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17~228页。

刘明宇、芮明杰、姚凯（2010）：《生产性服务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升级的协同演进关系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第66~75页。

刘奕、夏杰长（2009）：《服务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和作用机制：国际经验》，《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第64~68页。

[美] 迈克尔·波特（2002）：《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第178~220页。

汪德华、张再金、白重恩（2007）：《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经济研究》第6期，第51~64页。

Alderson, A., J. Beckfield and J. Sprague-Jones (2010), "Intercity Relations and Global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Urban Hierarchy, 1981-2007", *Urban Studies*, 47 (9), pp. 1899-1923.

Andersson, M. (2004), "Co-loc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A Simultaneous Equation Approach", *Electronic Working Paper Series CESIS*.

Bagchi-Sen, S. and J. Sen (1997), "The Current State of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Producer Servic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9 (7), pp. 1153-1174.

Bassens, D., B. Derudder and K. M. Otiso, et al. (2012), "African Gateways: Measuring Airline Connectivity Change for Africa's Global Urban Networks in the 2003-2009 Period", *South African Geographical Journal*, 94 (2), pp. 103-119.

Chen, X. and A. Kanna (2012), *Rethinking Global Urbanism: Comparative Insights from Secondary C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pp. 169-180.

Chubarov, I. and D. Brooker (2013), "Multiple Pathways to Global City Formation: A Functional Approach and Review of Recent Evidence in China", *Cities*, 35, pp. 181-189.

Coffey, W. J. and A. S. Bailly (1992), "Producer Services and System of Flexible Production", *Urban Studies*, 29 (6), pp. 857-868.

Cook, I. (2006), "Beijing: An Internationalized Metropolis", In F. Wu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City*, London: Routledge, pp. 63-84.

Derudder, B. (2006), "On Conceptual Confusion in Empirical Analyses of a Transnational Urban Network", *Urban Studies*, 43 (11), pp. 2027-2046.

Faulconbridge, J. R., J. V. Beaverstock and C. Nativel, et al. (2011), *The Globaliz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ies, Cities and Spaces of Creativity*, London: Routledge, pp. 30-45.

Friedmann, J.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 (1), pp. 69-84.

GaWC (2010), *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WC 2010*, <http://www.lboro.ac.uk/gawc/world2010t.html> [2018-09-21].

Glaeser, E. L. and J. E. Kohlhase (2004), "Cities, Regions and the Decline of Transport Costs", *Regional Science*, 83 (1), pp. 197-228.

Glaeser, E. L., J. Kolko and A. Saiz (2001), "Consumer C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 (1), pp. 27-50.

- Goerzen, A., C. G. Asmussen and B. B. Nielsen (2013), "Global Citie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cation Strateg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4 (5), pp. 427–450.
- Hall, P. M. (1966), *The World Citie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Hill, R. C. and J. W. Kim (2000), "Glob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 States: New York, Tokyo and Seoul", *Urban Studies*, 37 (12), pp. 2167–2195.
- Olds, K. and H. Yeung (2004), "Pathways to Global City Formation: A View from the Developmental City-State of Singapo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1 (3), pp. 489–521.
-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NJ: Princeton, pp. 25–70.
- Sassen, S. (2005), "Global City: Introducing a Concept",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Winter/Spring, XI (2), pp. 27–43.
- Sassen, S. (2006),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pp. 256–287.
- Shearmur, R. and D. Doloreux (2008), "Urban Hierarchy or Local Buzz? High-order Producer Services and (or)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Location in Canada, 1991–2001",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0 (3), pp. 333–355.
- Sheppard, E. (2002), "The Spaces and Times of Globalization: Place, Scale, Networks, and Positionality", *Economic Geography*, 78 (3), pp. 307–330.
- Siegel, D. S., M. Wright and A. Lockett (2007), "The Rise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t Universities: Organizational and Societal Implication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6 (4), pp. 489–504.
- Taylor, P., B. Derudder, J. Faulconbridge and M. Hoyler, et al. (2014),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Firms as Strategic Networks, Global Cities as Strategic Places", *Economic Geography*, 90 (3), pp. 267–291.
- Timberlake, M., Y. D. Wei and X. L. Ma, et al. (2014), "Global C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ities*, 41 (B), pp. 162–170.
- UN (2014),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4 Revis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Constructing the Multi-level National Service Industry Central Cities: Comprehensive Appraisal and Policy Suggestions

LIU Yi¹, LI Yao²

(1.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ASS, Beijing 100028,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of CAS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strategic positions of a country's central cities in the world's urban network are mainly decided by the functions of service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hancing the economic control power, the build-up of a powerful service industry nation can manifest in the way of functional construction and strategic layout of a multi-level service central citie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formation law of the global service-based central cities and the theorie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paper build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amework which includes

factor endowments, external and inner links, system factors, market scale, knowledge capital, development costs and consumptions, to conduct a competitive assessment of 105 Chinese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e should rely on Beijing and Shanghai to enhance China's lead and control capability in the global service network. Shenzhen, Guangzhou, Chongqing, Tianjin, Wuhan, Hangzhou, Nanjing, Chengdu, Xi'an, Zhengzhou, Shenyang, Qingdao, Changsha, Kunming and Urumqi are most promising to become comprehensive service central cities or specialized national service industry central cities.

Key Words: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centre; appraisal system

责任编辑：庄立

《城市与环境研究》被评定为“2018年度
中国人文学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新刊核心期刊



2018年11月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主办的第五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高峰论坛暨期刊评价峰会在京召开。会上正式发布了《中国人文学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城市与环境研究》被评定为“2018年度中国人文学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新刊核心期刊。

本次报告基于不同学科特点和期刊特点构建了差异化的指标体系，对我国1291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164种新刊及68种英文期刊进行了评价。其中，164种新刊仅评选出18种核心期刊，《城市与环境研究》位列其中。这是继入选2018《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之后的又一喜讯。《城市与环境研究》将以此为契机，再接再厉，与学界同仁一道，不断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努力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衷心期望广大读者、作者和审稿专家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本刊，竭诚欢迎城市与环境领域的专家学者惠赐佳作！